

■文学艺术研究

丝绸之路上散落的一颗文学明珠

——《弥勒会见记》

郑 玲

(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民族古籍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流布,西域出现了诸多极具文学艺术价值的佛典,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即为典型代表。《弥勒会见记》是一部融宗教色彩和文学创作于一体的翻译作品,它不但开启了回鹘民族戏剧文学创作的先河,而且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文学作品。

关键词:民族文献;《弥勒会见记》;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03-0099-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3.022

A Drama Pearl Scattered on the Silk Road——Maitrisimit

ZHENG Ling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ning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Ethnic Literature is the carrier of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valuable asse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there have been many great Buddhist scripture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value in which Uighur Maitrisimit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Maitrisimit is a piece of translation works integrated with religious and literary creation, which not only opened the Uighur ethnic drama literature precedent, but also the earliest extant works of dramatic literature.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Maitrisimit; Literary Value

一、《弥勒会见记》的诸版本

西域,历来为多种文化交融之地。在公元九至十五世纪长达600多年的历史中,在同西域其它民族的融合、宗教信仰的嬗变、中亚游牧文化、古印度佛教文化、中原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回鹘人曾以宽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各种类型的外来文化,众多的外来宗教诸如祆教、摩尼教、佛教、基督教等在回鹘社会中都得到了传播。毋庸置疑,在众多的外来宗教中,对回鹘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佛教传入新疆后,便得到城郭诸

国王室的接受和支持,迅速在新疆各地传衍和流布。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成为新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有唐一代,国力鼎盛,西域一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西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达到了其历史巅峰。佛教在西域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独具西域特色的民族文献典籍,其中尤以佛教典籍的交流、译传为甚,其时产生了诸多极具文学艺术价值的佛典。

作为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民族,历史上众多的回鹘译者鸠摩罗什、胜光法师等在引用而来的佛教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独立创作,涌现出了数量颇丰、

收稿日期:2016-11-11;**修回日期:**2016-12-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YY039)

作者简介:郑玲,女,河北石家庄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献与文化。

体裁多样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作品居多,既有宗教诗歌又包含有形式多样的民间诗作,诸如田园诗、格言诗、劝喻诗等。除诗歌这一主要体裁外,回鹘的戏剧艺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中不得不提的当属《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以弥勒生平事迹为叙事线索的佛教说唱剧本,由1个序幕和27个正幕组成,序幕为一般的佛教说教内容和布施者的功德回向文字,正幕则主要讲述弥勒的生平事迹。就其内容而言,该文献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作品,同时又夹杂有部分大乘佛教的观点。目前存世的《弥勒会见记》主要有两大语本,一为以吐火罗文为书写载体的文本,一为由回鹘文书写而成的文本,其中以回鹘文记录的《弥勒会见记》保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德国科学院,学界以该文献的发现地分别将其命名为:哈密本、德国胜金口本和木头沟本。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几大文本外,目前存世的还有于阗文本和粟特文本等残页,这些用古代不同语言文字翻译或记载的文本,都是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研究的重要补充材料。

二、《弥勒会见记》之内容

作为一部较为早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首先传承了佛经的以叙述文体为主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创造性的糅合了众多情节曲折生动、形象丰满多变的佛教母题故事,宛若一部佛教长篇小说,体现了佛教文学作品的自由创造与丰富联想的特色。

该文本的序幕为佛教义理的说教和施主所写的功德回向;除去序幕和尾声(第二十七幕)两部分外,第二至二十六幕为该剧的主体,主要描述聪颖灵慧的弥勒自幼拜跋多利婆罗门为师修行,一天,跋多利婆罗门梦中受天神启示,得知释迦牟尼佛已成正觉得佛果,此刻正在摩揭陀国孤绝山上布道说法,只因自己年迈体衰、老态龙钟而不能长途跋涉亲见佛祖为憾,于是派弥勒等16位弟子出家修道。此后佛祖释迦牟尼到波罗奈国讲经说法,讲述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弥勒听后便向佛陀请愿要求自己愿作解救众生脱离苦海的未来佛。之后作品描述了弥勒菩萨升上兜率天之情,后因怜悯受苦众生,降生于一大臣家中,又因“宝幢毁坏”感悟无常之理,弃家成道,终在龙华菩提树下修成正果,又于大小地狱之中解救受难众生。^{[1]5-10}

笔者以为,在已知的回鹘文佛教典籍中,哈密本

《弥勒会见记》的文学戏剧价值斐然,原因如下:其一,《弥勒会见记》是融宗教色彩和文学创作于一体的翻译作品。据该文本的跋语可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母本最初使用的记录语言为用“印度文”(ānātkāk tili),分别经由圣月菩萨大师(aryačantri bodiswt k̄ āri)和智护戒师(prtnaraksit kranwanzi-ki)之手,历经由古印度文到吐火罗文再到突厥语的二度翻译过程,不仅是一部描述未来佛弥勒生平事迹的讲经文书,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再创造的译典;其二,《弥勒会见记》是西域戏剧剧本的滥觞之作,可以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提供参考价值。内容宏富的回鹘文佛教经典——《弥勒会见记》在严谨紧凑的场景结构中,运用古朴典雅的人物语言对白贯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将众多耳熟能详的佛教人物形象诸如释迦牟尼、弥勒、跋多利婆罗门、王阿那律、摩柯罗倪等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因而,耿世民先生在论及《弥勒会见记》在西域戏剧史中的地位时曾感言:“自古以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不仅以歌舞之乡闻名于世,而且还以最早表演戏剧闻名于世。在历史上,新疆戏剧对内地汉族戏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弥勒会见记》不但开启了回鹘民族戏剧文学创作的先河,而且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文学作品,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弥勒会见记》之研究现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等地出土为数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关涉佛教。这些文献填补了诸多历史记载的空白,为研究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伴随着回鹘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记》的相继发现、刊布与释读,对该文献的相关研究进行重新总结回顾、梳理与前瞻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对于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文献释读刊布、版本对勘、语言学、宗教学、文学等几大方面。文献释读刊布在语文学研究中首当其中,对此德国突厥学学者葛玛丽·冯加班(A. v. Gabain)所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充分利用收藏优势,集中突厥学的研究力量,分别于1957和1961年对藏于美因茨科学院的113叶残篇和藏于

柏林科学院的114叶残叶(共计227叶)的《弥勒会见记》进行影印刊布,先后出版《弥勒会见记》——佛教毗婆沙师著作回鹘译本的影印本,除此之外,在两个影印本之外,附有该文献的研究报告一册,报告中对与弥勒相关的其他文献进行了简要介绍。可以说葛玛丽·冯加班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刊布工作为突厥学界该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隔二十年,土耳其人色那西·特肯(Ş. Tekin)在上述影印本的基础之上,以突厥学研究的国际范例对《弥勒会见记》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于1980年出版其题为《〈弥勒会见记〉回鹘文译本研究》(1)、(2)的著作,书中采用原文转写、德文释义和德文注释的形式对该文献进行了语文学的研究。

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1962年我国学者冯家昇发表了《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期)一文,开我国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先河;1987年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出版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1)》(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对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前五幕的内容进行了研究;2008年耿世民在其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出版,系统研究了回鹘文哈密本,研究逐渐深入。^{[2]68}

对于不同版本的《弥勒会见记》展开的对勘研究开启了学界研究的新视野、新思路:张铁山的《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比较研究》一文,首次运用对勘之法对两文本展开逐页逐句比较,标注差异,进行语言学、文献学、佛教学等多学科研究尝试;国外相继发表的文章主要有:Jens—Uwe Hartmann:《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比较》(Die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Maitreyasamitināka und Maitrisimit);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柏林吐鲁番研究中心藏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之比较研究》(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und die alttürkische Maitrisimit—Ausgewählte Texte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eter Zieme:《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其可能存在的平行本》(Ein alttürkischer Maitreya—Hymnus und mögliche Parallelen); Georges—Jean Pinault:《〈弥勒会见记〉之平行本吐火罗文本对回鹘文本之影响》(Contribution de Maitrisimit à l'interprétation de textes parallèles en tokharien)。

《弥勒会见记》中所蕴含的语言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先后有劳特(J. P. Laut)在其著作《早期突厥佛教及其文献》中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哈密本与德国本展开语言方面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Dieter Maue的《一个被忽略的回鹘词语〈m'ytry〉的语音问题研究》(Uigurisch <m'ytry〉—zu einem vernachlässigten lautlichen Problem)及国内年轻一代学者在语音、词汇等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柳元丰、艾力·阿布拉、热孜亚·努日、伊斯拉菲尔·迪拉娜等。

深入挖掘《弥勒会见记》中的宗教学价值及意义亦应是当前学界关注的新视点,有如德国学者 Jens Wilkens 的《“新日”与〈弥勒会见记〉——中世纪宗教问题研究》(Der Neutag und die Maitrisimit—Problem der zentralasiatischen Religionsgeschichte); Yukiyo Kasai:《古代突厥中的弥勒信仰源起考》(Der Ursprung des alttürkischen Maitreya—Kults); Melanie Malzahn:《弥勒(信仰)再生与语言学同语文学的辨析》(The rebirth of Maitreya and an encounter of linguistics with philology) Ablet Semet:《回鹘弥勒信仰的历史研究》(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itreya—Glaubens)等。

四、《弥勒会见记》——民族古籍文献之典范

民族古籍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作为民族古籍文献的典型代表,其文学价值表现有三:

(一)《弥勒会见记》的发现肯定了印度戏剧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可能性

关于《弥勒会见记》的文学归属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它是指图讲故事的底本、或为讲唱形式,亦或剧本雏形,都终归不应忽视在此中所包含的戏剧文学的要素,该剧本中有幕又细分为多个场次,有明确的演出时间、地点和场景,还标明了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并由此向我们展示了史诗型壮阔宏伟纵横捭阖的戏剧艺术结构。^{[3]426}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发现表明通过佛教经典的传译,回鹘人学会了来自古印度的戏剧表演,并且将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活学活用,经过再次创作,使得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文学风格异于吐火罗文本。笔者以为,《弥勒会见记》在由西向东传译过程中,其戏剧艺术已臻成熟,这无疑促进了西域戏剧的繁荣、对中

国戏剧史的发展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发现、刊布与阐释,为古印度文学在西域的传播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无论是吐火罗语本还是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作为出土于西域的戏剧史料,它们对于讨论影响中国戏剧产生发展的外来影响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126}

(二)《弥勒会见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多种翻译技巧的运用令文本呈现浓厚的口语色彩,贯通文意,增强其可读性

《弥勒会见记》的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二者之间存在原本和译本的关系,因此从翻译学的视角来比较两个文本可以看出,同一题材的《弥勒会见记》经过智护戒师之手编译为回鹘文的过程中,翻译技巧的使用,使得两个文本呈现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就回鹘文本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如下翻译技巧,如灵活运用汉译佛经的“五不翻”原则,“菩萨”等佛教专有名词,一般使用梵文;一些“中夏实无此术”的名物,使用梵文翻译,如 rahu 借自梵文 rāhu “罗睺”,wazir 借自梵文 vajra “金刚”等;为弘扬佛法的需要,既要保持佛经的严肃性,又需顾及受众的接受能力,积极使用譬喻手法,创造仿译词,比如“三宝”译为“üc ärdini”、“烦恼”译为“nizwan”等。这些仿译词丰富了回鹘语的表现力,更易于为回鹘人所接受,对佛教的传播和回鹘语词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使回鹘译文更加连贯,译者或增加原吐火罗文本中没有的内容,或增加一些词语或句子,使得回鹘译文更具口语色彩,增强该剧本的故事性,常见的词语如 anta ötrü “此后”、bu söz isid “听到此言后”等。由此看出,《弥勒会见记》在传译过程中,回鹘文本较吐火罗文本的口语色彩更加浓厚,更有利于向大众普及佛教思想。^{[5]308}

(三)从各种宗教在古代新疆的流行和分布情况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并非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各种宗教文化之间的共处与互镜

在新疆这一处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区,这种文化融汇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且最具典型性。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对包括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汉语等不同语族词语的借用,充分说明回鹘佛教在与东西方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中,既受到中原汉地佛教思想的强烈影响,也吸取了印度、中亚等佛教、摩尼教思想成分,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教特

点。对于《弥勒会见记》中有关未来佛弥勒的传说,耿世民先生推测其应受到摩尼教的影响,与古代伊朗关于救世主或者摩尼教中有关光明使者重返人世间的观念存在一定关系。除此之外,在《弥勒会见记》的序幕中提到的摩诃目犍连即大目犍连这一形象,在后世的佛教母体故事中,不仅成为敦煌变文等讲唱文学反复描写的对象,同样还成为中国后世戏剧文学的目连救母的主角。可见印度的戏剧文学、佛教艺术以《弥勒会见记》等为媒介和中途转译站,影响着中国各时代的戏剧艺术。

总之,民族古籍文献既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长期的传播交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其价值已超出了自身专业范畴,再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事实和历史走向。在微观层面上民族古籍文献客观描述不同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但在宏观层面上则为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地处欧亚大陆交接处的西域历来是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创制了语言类型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数量丰盈的传世巨著,这些优秀的民族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内容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凭借自身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有利于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大繁荣。无论是回鹘文本还是其他语本的《弥勒会见记》的重新问世,它们都为 中国佛教史、戏剧文学、翻译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资源。

[参考文献]

- [1] 耿世民.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 [2] 耿世民. 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3.
- [3]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4] 郑玲.《弥勒会见记》异本对勘研究——回鹘文(哈密本)与吐火罗 A(焉耆)文本之比较[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
- [5] 李强,柯林. 民族戏剧学[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李兆平]